

前 言

全球化带来了缤纷的希望，这一潮流迫切要求我们对全球化进行确切的文化定位。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两极，如何让文化之间彼此沟通，如何给我们自己定位？这就是这本书的主旨。我曾撰写过一些介绍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对话的文章，现在将这些文章进行收集和整理，结集出版。《全球化与中国》是一个来自法国的西方人和中国朋友的对话。这个西方人从他的中国朋友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愿意在此和读者朋友们分享对话的成果。

本书可分成三个主题：

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全球化的文化维度进行探讨，并尽力为文化间不断更新的对话定义一些词汇。

如果说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检视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在第二部分里，我们更关心检视的方式。之所以特别集中在暴力问题上，是因为社会中暴力的形式反映了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

最后，第三部分专注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传统与中国宗教的对话，因为宗教间的对话证实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交流之新的重要维度。这一部分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宗教语言的问题进行非完整的论述，风格与前面

两个部分迥异。世界上的宗教如何通过迥异的言语和传统进行宗教的灵性交流？全球化提出了热烈的交流的话题，宗教传统间的语言交流渠道成为一种载体。在尊重他人的文化、语言、信仰和传统的同时，我们的人性变得更加和谐统一。今天，人类宗教灵性的分享是有待我们完成的任务之一。细想想，全球化与电脑的中央存储系统颇有相似之处：世界为了运转，同样需要能提供文化灵性传统的软件。

再次重申，这本书不过是一次对话——永恒的、发展的对话的一个阶段。但愿读者可以对书的主题产生共鸣，如此，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对话的文化，梦想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张文英小姐，她非常精心地编辑本书，没有她，这本书就不会出版。我同样感谢沈秀贞小姐，她完成了本书的几乎全部中文翻译，近六年来，她以全部的耐心和才干帮助我用中文表述所有我想在此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此外，本书的第九、十、十一和十二章的初稿是由俞若虹翻译，第五章则应归功于念喜。最后，应感谢商务印书馆接受并出版这本书。

魏 明 德

2002 年 5 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 全球化与文化交流

“九·一一”事件之后，文化交流进入了倒退阶段。与此同时，经济与金融的交流却在持续发展。文化和文明似乎有自我封闭的趋势。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我将在这一部分尽力架构一个文化交流关系的正面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每个文化会在植根自身源流的同时迎接周围文化的提问和挑战，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开创一种新的人文智慧，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改革教育体系。

第一章 全球化与地域文化

“全球化”这个词汇的使用迅速扩展开来，但是更经常地涉及经济现象：人口和资金流通在全世界的增长、资金的运转使得世界金融市场愈加整合，区域经济对其他地区经济的强烈影响直至创造出同一的经济圈，而国际商业协定更加强了这一现象。

但是不要忘记，全球化最初也是指一种文化现实以及属于表现和意识范畴的内容。全球化首先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有限的世界里，这世界中所有的因素相互作用，自成体系。全球化也表现在思想、时尚、电影、游戏从地球的一个角落传播到另一个角落。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更兼有思维、文化和行为的方式。全球化是变化的因素，它使我们反省自己的传统和行为方式。全球化本身既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而是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调动自己的想像力以及相互协商和判断的能力。

全球化世纪的到来究竟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可以说，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它的事，我们需要决定是否愿意给它一个灵魂和一张面孔。很自然，全球化为所有的文化领域带来新的素材。它可以提供饮食、着装

的不同方式，提供我们希望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日常消费品，令我们以和亲人交流的方式与外国人交流，使我们读到和看到更多样的东西，形成对世界更丰富的看法。在有着深远历史的文化中，这种多样性应该是积极的，可以繁衍出新的文化的语言。如此，一场中国舞蹈演出可以将传统动作、中国古老文化题材与当代西方音乐家谱写的乐曲结合在一起，服装和色彩也许来自另一个亚洲国家，布景则表现超越民族界限的抽象风格。如此一来，全球化将成为创新的因素。它不会否定文化自身的特质，而是令其向着前所未有的方向发展。

不过，全球化也可以拥有摧毁一切的力量，不单是在经济领域，当它触及一种脆弱的文化时，在文化领域更为明显。比如在某个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世界的消费资料和思维方式过于突然的接触，经常导致自我的丧失和这个地区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自卑感。全球化最糟糕的后果将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比如森林资源），烟草、酒精、毒品消费的成倍增长，甚至是传统社会基础的瓦解。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地区，如果能得到合理的调配和监控，全球化同样可以成为创新的因素。外部的影响能够派生出教育的新模式，更加开放的同时又适应本地的现实。这样，教育模式可以吸收农业的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同时牢牢植根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或者，可以考虑新的旅游模式，大批的旅游者（全球化的另一个方

面)经常破坏这个地区,但也可能创造另类旅游的方式:体育旅游,当地人为旅游者提供场地;生态旅游,城市的人们学习知识,学会尊重动物和植物;文化旅游,应该超越所谓的少数民族求爱舞蹈和歌唱的简单模式,力图进入一种文化的神秘精髓。创造力还可以表现为汲取传统手工艺的技巧和图案,创造一种新的手工艺,甚至革新它的风格。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植根于平等的基础:和东方文化一样,西方文化同样面临着失去根的危险,非常需要参照自身的源流,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来创造新的表述方式,好过没完没了地重复一些既没有创造力也没有启示力的日常文化消费产品。

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文化方面,全球化既可以产生最好的结果,也可以产生最坏的结果。它可能加速每个文化对自身源头的忘却,那样,我们就只有一大盆共同的“汤”,一种建立在最平庸的参照和产品上的普遍的伪文化。或者,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我们的根源,通过与外部的接触经感应而再度发现,不是靠重复过去的文化形式,人类可以藉由这些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踏上追寻自然天性的种种潜能之旅,从而进行创造。我们必须挖掘个性才能达到普遍,但是,只有在我们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的个性时,才能够表达出自我个性的精华。

这里,需要反对时下中国十分流行的说法:比如,人们常说应该充分利用西方的技术,以壮我国威,扬我中华

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它会造成某种缺乏灵魂的伟大感。人们不会解剖一种文化的片段，再将其嫁接到自身文化的组织里。当人们进入某种文化时，就像是开始一段恋爱关系，沉浸在精髓里，相互渗透对方的逻辑和氛围，就这样被改变，根本无力“控制”变化的过程。人们会看到，在以此种方式被改变的同时，会更忠实于自身文化的原始启示。文化的对话更接近于一个有机的过程，而绝不会是个机械的过程。

让我举个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多年来，我一直参与《利氏汉法综合大辞典》编委会的工作。几年前，我们在一间对着花园的房间里开会。整个会议过程进行得相当困难。大辞典的工程在动工 45 年后，整个计划面临难产，甚至到了无法结束的地步，最后要拿的决定全部是最有争议的议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到这个园子走走，在这般决定的过程中，面对原有种种复杂的问题，不禁心觉气馁。园子的中央种着一棵雪松，我在这棵树前驻足片刻，欣赏着它树身的伸展，枝叶的多采，品味着和谐的味道，有某个垂直线条的伸展，也有组成一体的无数丰富的细部。那时，我想，这般类似的工程，如此丰繁，如此完美，成长得如此自然，直达到顶峰，而我们可怜的大辞典，尽管也是相当丰富，永远无法像这棵树这样来得丰繁，一言以蔽之，的确历经苦痛、曲折，在甚为不顺利的情况下成长。

的确，仔细想想，这番体验令人同样稍感宽慰，因为

它给出了一个佳喻来形容这个过程：这部双语大辞典就像一棵树。它就像两股巨型的根，一边深入法文的沃土，另一边则是中文的沃土，同时吸取双方的养分。这份沃土是语言和源流的沃土，是中文字义的多样性随着几世纪光阴的沉淀，同时也是法文的敏锐度的展现，得以精准抓住中文用语的微妙之处。因着如此，大辞典立于高峰之巅。所谓高峰，是人类的思潮在语言境界的拓展，藉由字汇与用法的独特性，显示出人性的普遍性。在大辞典的枝桠上，垂着的是文化智能结成的美味果实，有待读者采收与品味。

根源与高峰，的确是最重要的事。文化根源道出了这样的道理，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思潮或是创作，不是来自语言用法与历史的独特性。就高峰这个问题，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继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之后表示，双方要立于高峰与高峰，才能做出最好的交往，因为，在一定的距离之下，空间阻隔双方的因素，比起凝聚双方共同的高度，反而显得不重要。的确，从对独特性做长期的整理出发，辞典是我们的“基础”，然而这是一部能够提出一个哲学视角的作品，因为它证明了追求真理与追求沟通并没有相背离，而首要之务，在于语言间的沟通。

如果世上只有一种语言，或者说。面对语言的多样性，我们拒绝去聆听他人的语言的话，我们不需要辞典。这样两极化的情况，在巴贝塔(Tour de Babel)的神话里

都有阐明。相反，辞典的出现，是进入语言演进所做的一种赌注，从而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体验：进入沟通，并不代表放弃母语、弃绝滋养双方思想的智能。相反，双方做出语言与语言间相处的一种赌注，因着思想的引入、丰厚，方能在彼此的交流、进展当中，品味出真理的味道，就像我们品尝美味的果实一般。

在这个例子里，我找到了今天全球化的现象与坚守地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形象比喻。全球化改变了地方文化，但如果地方文化知道如何抵制平庸的东西和接受最好的东西，并持此种态度进入接触，就会令全球化呈现不同的局面。挑战在于越来越普遍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自我。从这一点看，是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更对自己文明发展的方向负有责任。没有任何预兆我们会成功，我们也可能朝着更加非人性和整齐划一的世界前进。但是，机会也在增加，有了我们置身其中的危险和新的文化源流，加上日渐丰富的交流，也许会令我们的文化朝更好的方向发展。问题先出在西方还是先出在中国并不重要。挑战是共同的，这才是我们的共同点，也才更令人兴奋。

第二章 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方对话

中西方的互动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一项事实。约略自公元 1600 年以降，这样的互动大致说来并没有断绝，而且对两个文明各自的发展，影响甚为重大。我们要探究的，乃是双方文化相遇所面临的新挑战，并描绘这份相遇在今日世界上的形貌。当今的年代往往被定义成一个“全球化时代”，显而易见的是，冠上这样的修辞难免在某个程度上流于口号、可能把许多性质迥然相异的现象不当地加入，并对某些现象避之不谈。同时，这个称谓又完全可以罗列出个形廓，指向一个特定事实，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基于“字”造“物”的说法，我们只要天真地认为，我们之所以置身在全球化的时代，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实情，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而且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年代，因此，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俨然“全球化”的世界上，对于文明间来往这般特定的维度，诸如中西方的对话，我们是否还能够把它单独区分出来，并加以分析呢？本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我要以上述的提问为幅度，对全球化的概念作一番省思，继而以这份省思为引，回溯中西方互动的源头。随后，本文

讨论西方象征的多元形象如何影响中国历史。最后一个部分，则是探讨最为完备的部分，则描述当代中西方对话面临的新挑战。

一、回观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词语，指的是一个过程。透过这个过程，社会与文化的结构原本受到的地理限制大为降低。由于地理局限化解，整体意识逐渐得到确立，因此，新的来往具有世界性的位阶，并且愈来愈加凝聚整合。对于这个过程，我采用的是结构性的观点，这也是为何我舍“世界化”，而采用“全球化”一词的原因。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史以来，人类已经在累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凡是有助于地球形成一个唯一而完备的体系，如各式的移民，或是领土与领土间的交往，都属于全球化的范畴。这个过程进行，既透过对话，也透过冲突：20 世纪的两次大战首次被命名为“世界大战”，正说明了这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也能够就现象的省察，侧重分析各种多元的时间进阶。正如我先前所提的，我们可以强调几个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特质。我们可以探索这个特质和现代化、资本主义出现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接下来，就近几十年的变迁，或称“后”的年代，如“后资本主义”、“后现代”、“后工业革命”等，我们将列出这个年代全球化的表征。这

三个向度并没有矛盾之处，各自有其不同的要旨与关注^①。

当“全球化”一词愈来愈走向普罗大众，其意涵与先前的年代是不是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又有什么值得一记，或是称道？这个年代应该发生了一个过程，若引用马克思的词汇，乃是量转化质的过程。这又要如何理解呢？举例来说，一个资本在量上的增加，某个程度上带来质的变化，造成生产模式的更新。再进一步说明的话，就是结论与观察的累积会造成科学范式的转移，从一个科学范式转移到另一个科学范式。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直接探讨这个命题：假设我们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派遣一艘航天飞机到另一个银河系，一个居有生物的星球，只要能源的储量不足以供应来回一趟的航行，即使短缺的只有少量能源，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质的有效突破。如果我们能提供足够的能源，量的增加会在瞬间产生质的重要突破。

这样的逻辑应该可以体现出，在近几个十年里，交流的累积已经跨越“质的门坎”，“全球化”一词不单单只是一个口号。我们可以把交流的类别分为产品的流通（近几十年的进步并不可观，比起其他的流通，商品流通与科技借取的进展显然不足），人才的流通（迅速增加），以及

^① 由社会学家撰写的现象学入门，请参见 Malcom Waters,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信息的流通（其中包含财务的流通），这一个项目的激增是全球化真正的推动引擎。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向度作分类：物的流通受限于地理因素，人们自然趋向于建立一个地方性的团体。而政治交流的最初，意指各个主权实体间的关系。如此看来，政治交流把世界变得国际化，而不是建立世界的体系。最后要提出象征意涵的交流，指的是空间中语言指涉物的交换，这是最具有自由度的交流，人类团体从而全球化^①。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给予某些征兆一个意义，并谈论一个真正全球体系的运行：

——信息从此被一个整合的管理系统来处理，卫星、网络等全都构成了具体的渠道；

——随着“星球意识”的出现，大家把某些环境、人权的问题，视为“世界性”的问题来谈论；

——政治交流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跨国关系，例如国家角色日趋减弱，区域团体出现，非官方组织及跨国组织的分量逐渐加重，都是几个明证；

——财流整合的出现与新式利益的结合，随全球化形成了一个附带的指标；

——思想体系的反馈是另一个附带的指标。举宗教间的对话为例，全球化使得各个信仰重新表达各自的本源；

^① Malcom Waters, *Globalization*, p. 9

——科学探索的过程指出，全球化影响某些媒介，人类从这些媒介决定未来发展的历程，人体基因绘制术的发现过程即是一例。

全球化乃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短时期内经历了加速的演进。空间与时间限制的缩减，有利于一个愈来愈整合的关系网的出现。全球化具有自省的特质，牵引经济、政治、社会的角色，使得后者愈来愈随着新的现势的逻辑作出反应，冲击也是双向的。全球化的过程使得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日益突显，笔者将在第二部分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了，全球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别，全球化是中性的。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现象，有灾难，有福祉。全球化有扩大的效应，连各种现象的多重效应也在内，无论是好是坏，都有它的一份。

二、中西方对话的源头

由此观之，我们再回来谈论中西方的对话，探讨双方对话在今日被定义的方式。这样的对话自一开始就不属于边缘的现象，自中西方相遇的时刻，早已指出一个方向，决定中西方的演进。我在此谈论的相遇，时间从 16 世纪下半叶开始，不包括双方最初期的交会。研究双方最初期的接触是很有意义的事，但这份相会并没有延续，而是到 16 世纪才有了新的开始。

利玛窦到中国

公元 1601 年 5 月，利玛窦(Matteo Ricci)获得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允许，在北京定居，并且领到一块土地，如今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尚可见到南堂^①的建筑物。自 1583 年抵华以后，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所求的就是这一份清朝王室的认可。他一生中最后的九个年头，都在北京广交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基督徒，扩充初期的翻译与译注工程的规模。利玛窦在中国作出三项革新，值得在此着墨评论，这三项革新显示出，中西对话的成形在这个年代具有普世的意义，指出了全球化过程的场域与挑战。

利玛窦先是绘制了世界地图，此一类型地图的完成在中国可说是头一回。这项工作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由此，我们大可把它视为中国内部的“哥白尼革命”，因为这项创举使得中国对“中”采取相对的看法。中国发现自身并不如先前所自豪的为中央之国，不是一个中土之国，也并非鹤立鸡群。中国发现自己只是世上众多国家中的一国。利氏制图引起的回响可谓多重而深刻。

此外，利氏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成中文。这并不是一个无心之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科

^① 南堂，即宣武门教堂，因位于北京南面而得名，为一座天主教堂

学与计算的理性，经过形式化后的准则与符号，成为科学与技术两者的定律总体的基础语言。这个语言具有普世的价值。在那个年代，耶稣会士为基督宗教护教做出辩论，认为他们引入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具有普遍性，因此基督宗教的普遍性也不言自明。由此观之，最终的问题是：科学与技术的语言具有普世性，但如何厘清它与基督教义、希腊罗马文化根源之间的承接？这仍是历史哲学开放讨论的问题。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说是通性与特性的课题。

再者，在《天主实义》一书中，利玛窦就唯一的、具有人格的、创造者的神进行推衍。这样的教义对中国而言，其语汇用字的确新颖，但是在中国传教并没有大家想见的那般遭遇到高度的困难。这个年代的人们尚未进入两个宇宙观对立的论战。这个教义之所以构成挑战，正如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传教一样，并非来自“一神”的概念，而属“降生”(incarnation)引发的轩然大波，或者“天主成人”(或称创世主义 créationnisme)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不管怎么说，利玛窦播下了哲学与宗教对话的种子，这种对话在今日仍在继续进行。

诚然，利玛窦的贡献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据当时的思考模式，并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采取的策略。在谈论文化交往时，特别是探讨中国与基督文明的峥嵘，我们必须跳脱出本质论(essentialisme)的窠臼，关注双方创造的过程。藉此，许多教义与革新才能得到接纳，也方能